

儿时

梧桐花开

史彦军



单位楼后的东侧，有一株碗口粗的梧桐树，坐在一楼办公室，打开窗户，那梧桐花如蜜般的香气扑面而来，迎着晨起的初阳，迎着和煦的春风，熟悉的梧桐花香气，让我陷入往日的回忆。

“一个，二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九岁的我把从梧桐树下捡回来的梧桐花一朵朵整齐地排列在八仙桌上。这六朵梧桐花得来不易，是与小伙伴们在南坡五爷家的梧桐树下捡来的。掉在地上的梧桐花，没有了花嘴上的盔帽，便少了魁梧英气，一朵朵散放在桌子上。

我把一朵梧桐花放在手心里，用两手小心翼翼地揉搓，直至花体呈现油亮绵软之际，然后捏紧梧桐花的花尾，嘴对着花嘴吹气，把嘴里的气吹进去再吸出来，梧桐花油亮的身子，便鼓一下瘪一下地翕动，憋着红脸吹一大口气，快速把花尾从嘴里拔出来，猛地拍击在另一只手掌心，“啪”的一声脆响，便是一个很好玩的游戏。

嘴里有些许甜丝丝的感觉，绕在舌尖稍纵即逝，可惜，只捡到些掉落的残花，如果能摘回戴着盔帽的、完整无缺的梧桐花，那香甜的花口可比残花强上许多，可那些完整的梧桐花还长在高高的树枝上，够不着，怎么办？我忽然看到院子里那根长竹竿，竹竿的顶端安装了两根铁丝，是父亲秋天摘梨的工具。我有了主意，用这根四米长的竹竿，肯定能拧下梧桐树高枝上的梧桐花。我扛起竹竿一蹦两窜地往南坡五爷家跑去，像一只火烧了屁股的猴子。

五爷的梧桐树长在院子的边上，树冠探出院墙铺散在路外，我站在树下的道路上，举起竹竿用其顶端缠紧的两根铁丝夹住一串梧桐花拧了几下，往下一拉便揪下一束来，时间不长，地上便堆了一大堆梧桐花，每串都花朵饱满，莹明甲亮鲜艳无比。我抱着满满一怀抱的梧桐花往家里走，浓郁的香甜之气直冲脑际，这么多的梧桐花，这么亮气的“盔甲战士”，幸福得让人提神又提气。

兴匆匆进了家门，迎头碰见父亲，父亲惊讶地问我哪来的梧桐花，我挥挥手里的竹竿，说，从南坡五爷家的树上拧下来的。父亲的嘴角一哆嗦，脸一下子就黑了，狠狠地扇了我一巴掌，我被打得原地转了三个圈，父亲气得手脚发抖，从墙上揪下笤帚，用胳膊夹住我的头，照着我的屁股猛打，边打边说：“你五爷的棺材本，你也敢祸害，看我不打死你！”说着，又是一顿痛击。奶奶在堂屋听到我的哭喊，深一脚浅一脚地跑来救我，待把我拉出来，护在身后，问清了被打原因，奶奶绷起脸看着我，说，活该挨打！那棵梧桐树是你五爷老下了之后，做棺材的木料，这你也敢下手，以后可不敢再去折枝毁树了，你折了树的手脚，树便长得慢了，而那树的木料对你五爷可有大用场。后来，父亲买了礼物去五爷家道歉，五爷推托着不要，笑着说，孩子么，都有闹腾的那几天，咱自家的孩子，掐些花花玩没啥，千万别打孩子呀！

后来，我长大了，也懂事了，才真正体会到大人的想法。农家人的树，都是被期冀了大用场的。五爷家里穷，没钱置买松木的寿材，就种了棵梧桐树给自己做寿材，这棵树便是五爷未来最大的希望，五爷岁数大了，梧桐树还没长成材，虽说梧桐树长得快，但五爷却日夜盼望着它快快长大，好能成为自己百年之后的有用之材。

我家的两棵大梨树也是被父亲寄予厚望的，父亲曾对我说过，等你结婚时，这两棵梨树便是给你做家具的木料。

我的乡亲，我的左邻右舍，他们庭院里的树木，也都饱含着家人们满怀深情的寄托吧。

我的老家在太原市晋源区。我很小的时候，二姨就嫁到了离家六七公里外的西寨村。

二姨年轻时常回晋源南城角娘家，我母亲嫁在本村，二姨回娘家时，既能看她母亲，也能看她姐姐。

我家和二姨家走动频繁。西寨唱戏那天，二姨家比办事筵还红火，除了二姨娘家人外，还有二姨夫家的亲戚，娃娃们高兴得不得了，在院里跑来跑去闹着玩着。

二姨陆续生了五个娃娃。我喜欢去二姨家，我是独生子，没有玩伴，二姨家娃娃多，红火热闹，每到寒暑假，我总会去二姨家小住一段。

时间慢慢流逝，我们一天天长大。1970年，二姨的大小子应征入伍，二小子被南郊区商业局招了工，街坊邻居好生羡慕，二姨高兴

亲人想起二姨

晓 根

得合不拢嘴。

随着城镇化发展，西寨村被拆迁。过渡期，二姨在小站营租了个平房待回迁。那年正月，我去小站营看二姨。这是一个独门独户的小院，二姨住在西房，家里显得有些凌乱。火炉上坐着茶壶，炉子边烤着馍馍片，三表弟泡的吃方便面。二姨以前可不是这个样子，总是把家里拾掇得利利索索、干干净净的。

中午我没有在二姨家吃饭，我不想给她添麻烦。二姨再三挽留，

邻里

老邻居三哥

言 瑜



1950年夏，父母带着我和弟弟从太原市杏花岭街搬到了大东门街（现府东街，杏花岭小学东墙到省建筑设计院的一段），那是一个四面瓦房、铺满青砖的四合院。院中有七八户人家，大多是男人们在外工作，女人们在家操持家务。

院里几个年龄差不多的孩子都上小学，只有房东家的三儿子在读高中，院中小孩都称呼他“三哥”。

三哥约一米七高，国字脸，留分头，戴深棕色边框近视镜，衣着朴素，但干净整洁，走路时总是挺胸抬头，目不斜视。三哥很用功，很严肃，显得自信清高，不搭理我们这些小孩儿，只要他一放学回家，戏耍吵闹的小孩们便不敢大声喧闹，都静悄悄的，整个院子里只有三哥朗朗的读书声。他有时读高尔基的《海燕》，有时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上几段，而后放声高歌当时流行的苏联歌曲“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田野小河边，红莓花儿开……”

三哥很尊敬我母亲，因我母亲曾在校尉营小学当过老师，他和我母亲常一起讨论一些唐诗宋词、鲁迅的作品。房东家生活不富裕，但支持三哥买书。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三哥有一本老版《阿Q正传》小人书。弯弯

的月亮高挂在天空，月光下头戴破毡帽、肩上搭着小辫子的阿Q怀揣萝卜，一脸囧像，正急急忙忙爬上寺院墙头往外逃，墙根下有一身穿长袍的老尼姑高举着手指着他骂，旁边一只大狗翘着尾巴起劲地狂吠，有趣的是一只萝卜正从阿Q的怀中掉出来。这有趣的画面一直深深印在我脑海里，只要一提鲁迅，这幅阿Q月夜翻墙偷萝卜的画面便浮现眼前。三哥的学习态度、劲头、方式极大地激发了我对文学的兴趣和爱好。

1950年冬天母亲生了二弟后在家休息，听说招考小学老师，母亲赶忙报名，但父亲想让母亲在家看孩子，不同意。三哥知道后不平地说：“新社会人人平等，谁也不能阻止你工作，你应该继续当老师。”在三哥的鼓舞下，母亲又参加了工作，走上她热爱的教育岗位，直到八九十岁时，她还念念不忘，非常感谢三哥对自己的激励。母亲有了工作，才担当起养活我们一家的重任，才在精神上、事业上有了进步和提高。

三哥后来上了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一直在一所重点中学教语文。他认真钻研，把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了教育事业，他教的学生遍布大江南北，可谓桃李满天下。

我还是放下礼物离开了。二姨一直把我送到街门口，我挥手向她告别时，我看到二姨眼眶里有泪。二姨舍不得让我走啊，想让我多陪她一会儿。我当时没想到这一层，若想到，我就不会走了，陪二姨吃顿饭该多好。更让我没想到的是，这次一别竟成了我和二姨的最后一面。此刻，我悔疚的泪水夺眶而出。

二姨的一生充满了坎坷。她养育了四女三男，先后失去两个女儿。在她晚年，三儿子因车祸下肢瘫痪，大儿子也因病先她而去。二姨以坚强的意志，承受住了一次次人生的不幸和命运的打击。在别人眼里，也许二姨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但在我眼里，二姨是一位意志坚强、不向命运低头的伟大母亲。

乙丑冬月，一场脑梗使我左眼“动眼神经”麻痹，严重影响视力，无法独立行走。住院治疗半个月后回家康复锻炼。我的学生贝贝在香港工作，她听说后立刻买了一台“智能护眼仪”，寄回太原。我一早一晚都戴上这远道而来的“护眼仪”，在轻音乐伴奏中享受专业按摩。病情一天天好转，那些温馨、生动的师生往事又一幕幕浮现脑海。

1989年我49岁，担任一年一班的数学教学并兼任数学教研组组长。我参加工作以来，教过初中的几何、代数，教过小学中、高年级的数学，而教小学一年级数学却是头一回。掐指算来，从当时教到他们小学毕业，我正好55岁退休，他们就是我的关门弟子啊！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我从教30年来的经验都用在他们身上，努力培养他们良好的学习习惯，帮他们打下扎实的数学基本功。我喜欢每一个学生，无论是男孩、女孩，都把他们当成孙辈看待。其

师生

我的学生贝贝

安淑媛



中有个小女孩叫贝贝，长得眉清目秀，文文静静。她父亲是我们宿舍区派出所片警，为人热情厚道，在居民中口碑很好，母亲也在公安系统工作，平时都很忙。刚上二年级，贝贝爷爷去世，他爸妈回老家奔丧，她只好住到我家。小小年纪的贝贝非常懂事，我拉着她的小手，一起上学，一起回家，吃完饭就写作业。晚上她自己洗脸、洗脚，上床睡觉，一点也不累人。

贝贝很聪明，学数学几乎不费劲。一、二年级小学生要熟记20以内加、减法，要求脱口而出。贝贝最先过关，还给老师当助手检查同学背诵。我们班学生每次数学考试得满分的占一大半，贝贝每次都是满分。我给得100分的学生发奖品，是一枚用红纸剪的小五角星，贝贝把奖品拿回家，非要和她爸爸的功章放在一起。她妈妈说：“贝贝让爸爸、妈妈坐在小板凳上当学生，自己当老师，奶声奶气地说‘我是安老师！’”后来，我教他们到五年级提前退休，校长挑全校最好的数学老师接了班，送他们到六年级毕业。

贝贝到山西省实验中学读书，依然学业优秀，高三毕业后到法国留学。临行前，我们一起去汾河景区游玩，留下美好的纪念。

光阴似箭，当年的一年级小学生已经是30多岁的职场高管。贝贝从香港请假回并探亲，和她父母一起来我家小坐，看着她成熟干练，我心里涌起无限感慨：教师是平凡的，是润物无声的奉献，它能培育出灿烂的花朵，能浇灌出参天大树。如有来生，我还当教师。

长辈

『猕猴桃』

李鼎煜

本文中的“猕猴桃”不是水果，而是一个人，他是我们学校的保安。至于他的真名，却没多少人记得。

他总是穿着保安服，圆脸，面色褐黄，看起来的确有点像没剥皮的猕猴桃。他个子矮矮的，时时拎着根警棍，警惕地巡视着。每天放学时他操着一口乡音，让每个学生路上注意安全。

我们这些半大小子刚开始背地里叫他“猕猴桃”，后来当面喊，喊完大笑着跑开。他默默地看着我们，阴郁着。但依旧每天微笑着，跟每一个过往的同学打招呼。

一天，校园失窃，价值上千元儿的几辆自行车一夜间不翼而飞。过了几天，校门口贴出告示，说窃贼已归案，并让丢车者到公安局辨识，一时间皆大欢喜。

后来才知道这事跟“猕猴桃”有关，听说是他捉住行窃小偷，并扭送到公安局。原来，我们的“猕猴桃”先生在知道自行车失窃后十分惊怒，主动跟同事换了一个星期的夜班，整晚在校园里转悠，在停车棚边守株待

兔。

那时，正是寒秋。他披件军大衣，警棍随身带着。他是怎么捉贼的，具体情节谁也不清楚。有人传言，他英勇神威，一警棍就把小偷撂倒在地；也有人传言，他一口乡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小偷自惭形秽，跟他投案自首。流传最广的是：他看见车棚边有个黑影，攥紧警棍，慢慢靠近，怒吼一声：“干什么的，不许动！”颇有威势。那窃贼被他骇住愣了几秒，开始向院墙跑。“猕猴桃”血脉贲张，爆发出惊人力量，终究在窃贼开始翻墙时把他拽了下来，“招呼”了他几警棍。

接下来的几天他都没来上班，听说是病了：年近花甲，又在寒秋的夜晚中冻了几夜，感冒了，随即查出心脏有点问题。

一个月后，他回到岗位，还是那张微笑着的褐黄的沟壑纵横的脸，满是岁月的痕迹，但我们却觉得是那样亲切与舒服。大家依然叫他“猕猴桃”，他依然笑着答应，但我们的叫声中少了取笑与戏谑，多了诚恳与佩

服。

临近中考，百日誓师，我们拿着自己的小旗去找每一位老师签名，不知是谁提出要去找“猕猴桃”签名，于是一呼百应。头发略白的“猕猴桃”被学生们围在中间，用记号笔笨拙地在每一面旗子上签字。他十分有自知之明，直接写下“猕猴桃”三个字。“大爷，您给我签您的名字吧！”轮到我时，我要求道。他愣了一下，看了我一秒钟。那一眼，似乎有疑惑，但更多的是欣喜。他大大方方地写了自己的名字，是那么朴实无华。

后面的同学也纷纷附和，让他签自己的名字，他被围在中间，满头大汗，但脸上是止不住的笑容。

自我们这届之后，找“猕猴桃”签字也成了一项传统。往届学生回来看望老师，总要去看看“猕猴桃”，大家都有说不完的话。“‘猕猴桃’，是那个门卫大爷吗？”“是呢，他守护这里不知多少年了。别看他又矮又胖，他可是跟窃贼搏斗过呢！”

俨然，他成了这里的守护神。猕猴桃，外丑内甜。